倡导精神文明　探索现代理念　营造文化氛围　弘扬传统美德

福寿园

http://www.fsygroup.com
http://e.weibo.com/fushouyuan

追忆红色先驱 缅怀革命情谊

中共早期四位领导人纪念像落成仪式专刊

福寿园
FU SHOU YUAN

福寿园集团主办　2014 年 3 月 28 日　农历甲午年二月廿八　2014 年第 1 期　总第 88 期　地址:上海市漕溪北路 88 号圣爱大厦 1306 室　电话:021-54255151　邮编:200030

瞿秋白：从热血书生到一代革命先驱

他唱着自己翻译的国际歌走向刑场

作为我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瞿秋白是党内公认的“才子”，他也是最早将《国际歌》译成汉语并附上简谱的人。

瞿秋白（1899—1935），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奠基者之一。

瞿秋白原名瞿双，后改名瞿霜、瞿爽，江苏常州人。1920年初，参加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0月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特派记者身份赴莫斯科。1923年春回到北京，7月赴上海参与上海大学（1927年被取缔）的创建，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1928年4月去苏联，1930年8月从苏联返回上海，次年，在上海参与了“左联”的领导工作。1934年至瑞金，次年2月在福建长汀被捕，6月18日英勇就义。遗著收入《瞿秋白文集》。

瞿秋白是中国第一个翻译《国际歌》的人，也是唱着这首战歌走向刑场的伟大战士。

秋白自述 一个革命者的磊落轶荡

二十世纪的开始，是我诞生的时候，正是中国史上的新纪元。中国香甜安逸的春梦渐渐惊醒过来，一看已是日上三竿，还懒懒的朦胧双眼欠伸着不肯起来呢。从我七八岁时，中国社会已经大大地震颠动摇之后，那疾然翻复变更的倾向，已是猛不可当，非常之明显了。幼年的社会生活受这影响不小，我已不是完全中国文化的产物；更加以经济生活的揉挪，万千变化都在此中融化，我不过此中一份而已。

——摘自《饿乡记程》（1921年10月）

我寻求自己的“阴影”，只因暗谷中光影相灭，二十年来盲求摸索不知所措，凭空乱舞我的长袖，愈增眩晕。如今幸而见着心海中的灯塔，虽然只赤光一线，依微隐约，总算能勉强辨得出茫无涯际的前程。何况孑然飘零，远去故乡，来此绝国，交通阻隔，粗粝噎喉，饿乡之“饿”，锤炼我这绕指柔钢，再加以父母兄弟姊妹，一切一切，人间的关系都隔离在此饿乡之“乡”以外。如此孤独寂寞，虽或离人生“实际”太远，和我的原则相背，然而别有一饿乡的“实际”在我这一叶扁舟的舷下——罗针指定，总有一日环行宇宙心海而返，返于真实的“故乡”。

——摘自《饿乡记程》（1921年10月）

一只羸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辎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的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我在负责政治领导的时期，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欲罢不能的疲劳使我永久感觉一种无可形容的重压。精神上政治上的倦怠，使我渴望“甜蜜的”休息，以至于脑经（筋）麻木，停止一切种种思想。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共产党四中全会开除了我的政治局委员之后，我的精神状态的确是“心中空无所有”的情形，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摘自《多余的话》（1935年5月）

当我开始我的社会生活的时候，正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的浪潮非常汹涌的时期。为着继续深入的研究俄文和俄国文学，我刚好又不能不到世界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去。

我那时的思想是很紊乱的：十六七岁时开始读了些老庄之类的子书，随后是宋儒语录，随后是佛经、《大乘起信论》——直到胡适之的《哲学史大纲》、梁漱溟的《印度哲学》，还有当时出版的一些科学理论、文艺评论。

在到俄国之前，固然已经读过倍倍尔的著作、《共产党宣言》之类，极少几本马克思主义的书籍，然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根本说不上的。

——摘自《多余的话》（1935年5月）

从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三〇年，整整十年我离开了“自己的家”——我所愿意干的俄国文学的研究——到这时候方回来，不但田园荒芜，而且自己的气力也已经衰惫了。自然，有可能还是干一干，“以度余年”的。可惜接着就是大病，时发时止，耗费了三年光阴。

——摘自《多余的话》（1935年5月）

我留恋什么？我最亲爱的人，我曾经依傍着她度过了这十年的生命。是的，我不能没有依傍。不但在政治生活里，我其实从没有做过一切斗争的先锋，每次总要先找着某种依傍。不但如此，就是在私生活里，我也没有“生存竞争”的勇气，我不会组织自己的生活，我不会做极简单极平常的琐事。我一直是十分难受，因为我许多次对不起我这个亲人，尤其是我的精神上的懦怯，使我对于她也终究没有彻底的坦白，但愿她从此厌恶我，忘记我，使我心安罢。

我还留恋什么？这美丽的世界的欣欣向荣的儿童，“我的”女儿，以及一切幸福的孩子们。我替他们祝福。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的。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伟的工厂和烟囱，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从前更光明了。

但是，永别了，美丽的世界！

——摘自《多余的话》（1935年5月）

卜算子·咏梅

寂寞此人间，且喜身无主。

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

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

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

——瞿秋白 1935年于福建长汀狱中

千秋英烈

父母的爱情：秋之白华

父亲秋白在母亲之前有过一个夫人，她叫王剑虹，是丁玲在上海平民女子学校的好朋友。从两人相识到结婚，不到半年时间。遗憾的是，剑虹不久就因患肺结核去世。

父亲与母亲杨之华走到一起那是后来的事了。母亲是个家道中落的绅士门第小姐，被人称为有“超群的美貌”，人家喊她“小猫姑娘”。20岁出头的时候，她和我的生父沈剑龙相爱成婚。我生父不愿意吃苦，他和朋友一起到上海以后，经不起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生活的引诱，堕落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很紧张。1922年母亲只身赴上海参加妇女运动。1923年底报考上海大学，被社会学系录取。母亲第一次听瞿秋白的课就对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父亲那时候已是一个领导人，又是教授，母亲觉得他很平易近人。母亲当时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妇女部担任部分工作，与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向警予认识。不久，在鲍罗廷家中的一次会见，母亲对秋白有了近距离的接触。母亲很同情父亲，王剑虹去世后，就一直照顾他。他们俩相处不久，秋白就提出来要跟她结婚，母亲就说我有爱人，感情虽然不好，但是没有正式离婚。母亲对他的才华是十分倾慕的，但母亲有些不知如何是好，就暂时回避到浙江萧山母亲家。然而，执著的秋白放不下对母亲的思念，在学校放暑假的时候来到萧山。母亲的哥哥和沈剑龙是同学，见到这种情况，他把沈剑龙也请到家里。沈剑龙和秋白一见如故，他对秋白的人品与才华十分敬仰，然而面对复杂的感情问题，需要把一些事情谈开。于是他们三人开始了一场奇特的谈判。

之后，沈剑龙同意离婚，但是要求在《民国日报》上登三个启事：一个就是母亲跟沈剑龙解除婚姻；一个是母亲跟秋白结婚，那个时候叫恋爱关系；然后，秋白跟沈剑龙确立朋友关系。虽然“五四运动”以后社会比较开放了，但是这件事情还是轰动了上海，一时议论纷纷。192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报纸上登出这三个启事的同时，秋白和母亲在上海举行了结婚仪式，沈剑龙还亲临祝贺。

为了纪念他们的结合，父亲在一枚金别针上亲自刻上“赠我生命的伴侣”7个字，送给母亲。这一爱情信物，后来伴随母亲度过了风风雨雨几十年。他还专门刻图章，父亲对母亲说：“我一定要把‘秋白之华’、‘秋之白华’和‘白华之秋’刻成三枚图章，以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你无我、永不分离之意。”母亲说：“倒不如刻‘秋之华’和‘华之秋’两方更妥帖、简便些。”后来，瞿秋白终于刻了一方“秋之白华”印章。

瞿独伊口述

李立三：一生有过三次追悼会的革命家

他的一生同中国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

李立三（1899-1967），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

李立三原名李隆郅，曾用名李能至、李成、柏山、李明、李敏然等，湖南醴陵人。

1919年9月，李立三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回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地方和中央担任工人运动领袖，曾一度掌握着中央的实际权力。

在斗争岁月中，他曾经"死"过三次，组织和同志们为他开过三次追悼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立三历任中共中央工会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书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劳动部部长、党组书记，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工业交通工作部副部长。

李立三曾主持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

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发言，对自己过去的错误进行了诚恳坦率的解剖，进行自我批评，受到好评，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

"文革"中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残酷迫害。1967年6月22日蒙冤逝世。

1980年3月，中共中央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李立三的一生是坎坷而多难的，但他也是幸运的，因为在无数次人生磨难与挫折中，他始终拥有一份来自俄罗斯妻子的坚贞的爱情，这份来自俄罗斯的爱在残酷的政治考验中显示了它的珍贵和崇高。

从李立三更名看其一生

1899年11月18日，李立三生于湖南醴陵县城郊阳三石芋园府内。李家在当地为书香门第，曾祖父、祖父、父亲都是秀才出身，其父是当地一名教书先生，给他取乳名为"凤生"，后为辟邪躲灾又取名"狗妹子"。读小学时，又给他取名李隆郅。

十二三岁时，李立三在醴陵县渌江中学读书时，常以"忧国子"为名，写主张救国的政论文章。在长沙长郡中学读书时，曾循着"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与毛泽东结交。中学毕业后，毅然"投笔效班侯"，加入到程潜将军领导的"护国军"中去。

李立三青年时期写的诗词汇辑为《芋园诗草》，署名为"芋园"。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于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以"佐夫"为名，在《旅欧周报》上发表文章，获得徐特立、赵世炎等人的支持。因领导学生运动，被武装押解回国。

1921年李立三在上海加入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并接受陈独秀的派遣回到湖南，跟随毛泽东赶到安源，参加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以"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取得全面胜利。其间，为了方便在工人中开展工作，他改名李能至。

1924年3月，李立三被中共中央调到上海，去加强那里的工运斗争，公开使用的名字仍是李隆郅，半年后改为"李立三"。这个名字在社会上传开以后，曾引起种种议论，学究们说他胸怀大志，要"立德、立功、立言"。国民党人士牵强附会，说他"决心转向"，要由信仰马列主义转为"三民主义"。其实改名的缘由只是为了方便更多的工友认识。

在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中，李立三担任总指挥，给帝国主义沉重一击。李立三被通缉，随即赶赴苏联。李立三第一次到苏联，使用的名字是"秦进有"，并以此化名在共产国际会议上发言，报告了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情况，呼吁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援助中国。之后回广州，参加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并成为全国总工会的主要领导者之一。

北伐战争时期，李立三奉党中央之命，由上海抵达武汉。1927年1月5日，他带领几十万群众冲入汉口英租界。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最早收回外国租界的一场斗争。

1927年7月，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中共中央改组，李立三被选为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委员。在他的倡议下，经中共中央批准，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澎湃四人领导了南昌武装起义。

1928年秋，李立三回沪，化名肖柏生，以古董商人的身份开展地下党的工作，曾分别以立三、柏生等多个名字发表演说和政论文章。

1930年10月，李立三奉共产国际之命到达莫斯科，并取俄国名字——亚历山大·拉宾，同时改用中国名字——李明。

1946年1月从苏联回国，党中央安排他以李敏然为化名，作为共产党一方的代表加入军事调停执行处东北小组的工作。

在新中国的创建过程中，李立三协助周恩来做了大量工作。

"文革"中，李立三被诬陷为"里通外国"的苏修特务。1967年6月22日服毒自杀，遗体被造反派挂上"服毒者李明"的牌子送往火化。

1980年3月，中央举行李立三同志追悼会，为其平反昭雪。

摘自《中国工运历史人物传略 李立三》

李立三与妻子李莎、女儿李英男合影

《井冈好》

井冈好，太阳出得早，
照破迷天雾，万物皆觉晓。

井冈好，红旗举得早，
星火可燎原，东方初破晓。

井冈好，红军建立早，
工农齐武装，成败已分晓。

井冈好，东风吹得早，
压倒西风日，全球皆报晓。

李立三作于1965年8月

千秋英烈

我选择真爱 我来到中国

"中国"，这一国名其实很早就嵌入我的记忆。我刚识字不久，就开始阅读安徒生的童话。当我翻开《夜莺》的故事，插图上的红墙黄瓦、华丽的宫殿以及神秘的庙宇和宝塔顿时激起了我的好奇心："这究竟是什么地方？"安徒生的童话故事告诉我：这就是中国。于是在我的心目中，中国就这样被镀上了童话般的绚丽迷人的色彩。

我翻阅着沃洛佳哥哥订的画报、杂志，特别注意有关中国的消息和插图照片。张作霖、吴佩孚这些大军阀的名字不断出现在字里行间，但他们之间的混战、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于我则完全是一本糊涂账，也毫无兴趣。

《星火》杂志里的图片最多，因此一直是我喜爱的社会读物。记得一期封面上印有一位中国妇女的大幅照片，她面庞庄重、秀丽、慈祥而温婉，一双深沉、略带忧郁的眼睛给人以极深的印象。她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者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宋庆龄女士。没想到几十年后，我会有机会在天安门城楼上和其他一些场合亲眼见到她。

另一幅照片则出其不意地征服了我。照片拍摄的是一次群众集会的场面，广场上人山人海，全是黑头发、黑眼睛的人，高高的讲台上站着一个高个儿的男子，他身穿长袍，慷慨激昂地向大众发表革命演讲。他那只伸向前方的右臂显得那么强劲有力，仿佛正举重若轻地托着一块看不见的千斤磐石。我暗自思忖，一个真正的革命鼓动者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具有这样的伟力。一种无限的崇敬、钦佩之情在心中油然而生。照片下的几行文字告诉我：这是上海"五卅运动"中的一次工人集会，台上发表演说的是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李立三。

啊，李立三！我轻声读着这个陌生的名字，久久凝视着他那坚毅的神情，他那有力的右臂。我想，在他猛然挥手的瞬间，他一定向听众们发出了一个震撼人心的号召。当时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李立三，日后会在我心间播下一粒爱情的种子，把我一生一世的命运与千里之外的中国紧紧联系在一起。

摘自李莎《我的中国缘分》

背景资料

李莎，原名叶丽萨维塔·基什金娜，**1914**年生于俄罗斯萨拉托夫州。**1936**年与李立三结婚，**1941**年毕业于莫斯科外语师范学院，**1946**年随夫来到中国，后加入中国国籍，长期从事俄语教学工作，先后在哈尔滨俄语专科学校、北京俄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这位坚强的俄罗斯女性，用她的真爱，陪伴丈夫度过坎坷的岁月。

建党伟业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现代中国史上开天辟地的伟大事业，从上海起步。从此，上海这座伟大的城市，与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和壮大，与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

“红色三部曲”的作者、当代著名作家叶永烈曾撰文指出：对于中国漫长的历史而言，1921年7月23日至31日，确实是不平常的一周。这一周使“中国改换了方向”，是中国现代史上“红色的起点”。

自此，众多仁人志士为了民族复兴、国家富强而不屈不挠，无数先烈为了追求真理、前赴后继，留下了一段段可歌可泣、刻骨铭心的红色记忆。

红色丰碑

先驱风范 世代敬仰

上海青浦城南，福寿园中，芳草连天，一派疏朗开阔景象。区别于沪上城市的喧嚣繁闹，在这里，楼亭叠翠，鸟语花香，仿佛在向世人展示着它独有的静谧与安详。

自1994年创立以来，通过“公墓变公园、祭祀变纪念、告别变美丽”的理念革新，福寿园承担起引领行业发展的行业责任，回馈社会温暖的社会责任，以及保护和传承历史文脉的历史责任，在注重人文关怀和追求文化艺术的道路上，致力于塑造现代殡葬的全新形象。先后有章士钊、蔡元培、乔冠华、闻一多、陈毅等六百多位各界名人纪念碑或纪念像进入园区。2010年还正式成立了人文纪念博物馆。园内的劳模丰碑园、刑警之魂纪念墙、新四军广场、上海市红十字遗体捐献者纪念碑等，已成为重要的生命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

为纪念和缅怀中共早期四位领导人的历史功绩和革命情谊，经与家属沟通协商，决定在福寿园人文纪念公园为瞿秋白、李立三、秦邦宪、张闻天夫妇建纪念像，以供后人追思瞻仰。

自2012年冬开始，在著名雕塑大师唐锐鹤和王松引教授的指导下着手雕像的设计创作。历时一年多，整个雕塑制作及配套工程于今年清明节前完成。自此，福寿园“志清苑”中，又增添了一处重温红色记忆和革命历程的所在。这里，定格着四位领导人最神采的瞬间；这里，展现着他们最朴素温暖的性情；这里，更穿越时空传递出生命的意义与价值。

福寿园人文研究所供稿

福寿园集团副总经理葛千松与福寿园艺术总监王松引教授探讨雕塑创作

追忆红色先驱　缅怀革命情谊

中共早期四位领导人夫妇纪念像落成于上海福寿园

风云往事·中共早期领导人与上海

热血书生领袖——瞿秋白

人杰地灵的常州是瞿秋白的衣胞之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瞿秋白开始了他豪迈而曲折的革命生涯。1920年加入李大钊、邓中夏等创办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0月，应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的聘请，他与李宗武、俞颂华以特派记者身份前往莫斯科。1922年春，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先后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举行，中国共产党派出以陈独秀为团长的代表团参加会议，瞿秋白以翻译身份参加，并担任陈独秀翻译。1923年1月他回到北京，7月赴上海。除了理论宣传和党务工作之外，瞿秋白又接受了一项新的任务：参加筹建上海大学。瞿秋白时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并由他主讲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几门课程。根据这几门课的讲义，后来整理出版了《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社会科学概论》等专著。

1925年2月，上海日本纱厂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了著名的“二月罢工”，瞿秋白十分重视并参与指导工作，领导罢工运动推向高潮。并在之后上海工人两次武装起义中，提出纲领性的意见。

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指定瞿秋白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央工作，成为全党的最高领导者。

中国工运领袖——李立三

李立三出生于湖南醴陵。1919年9月，他赴法勤工俭学，积极参加留法学生的爱国运动。1921年因参与领导留法学生进驻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被法国当局遣送回国。当时，李立三、蔡和森等104名中国学生被押上一艘邮船，其中唯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是陈公培。一到上海，陈公培便带着李立三、蔡和森去见陈独秀，经中国共产党中央同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20世纪20年代，小沙渡地区曾是上海工人运动诞生的摇篮之一，沪西工人在“五四运动”中最早登上历史舞台。1920年2月，陈独秀从北京来到上海，深入调查小沙渡地区和码头工人的罢工情况，开始了工人运动的启蒙宣传，并以工人运动的基地——上海作为建党中心。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许多党的早期领导人和工人运动领袖到小沙渡地区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了一大批工人运动骨干和积极分子。

1925年3月，李立三来到上海开展工会运动，他和邓中夏等领导的小沙渡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是当时上海规模最大的一次。此后，在抗议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的斗争中，他任现场总指挥。“五卅惨案”发生后，被公推为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参与领导了“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并一直坚持在斗争第一线。

中共史上最年轻的领袖——秦邦宪

秦邦宪，1907年生于无锡书香世家。1925年5月“五卅惨案”发生后，年仅18岁的秦邦宪以苏州“二工”学生会会长身份，积极参加并领导苏州、无锡等地的反帝斗争。1925年8月，他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

上海大学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由国共两党共同创办的一所培养进步人才的学校，有“革命摇篮”之称。在这里，秦邦宪有机会聆听到瞿秋白与恽代英等老师亲自讲授的马列主义理论课。当年10月，经顾谷宜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上大党组织派秦邦宪去上海国民党特别市党部，从事国共合作工作。由于突出的工作成绩，1926年10月，他被组织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留学苏联时，他取俄文名字BORYHOB，中文音译“博古诺夫”，这也是“博古”之名的来历。1931年9月，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秦邦宪临危受命，主持中央工作，挑起了领导中国革命的重担，时年24岁。

秦邦宪之女秦吉玛、女婿李海渊与王松引教授合影

红色教授领袖——张闻天

张闻天，1900年出生于上海南汇县祝桥区六团乡（今浦东新区施湾乡邓三村），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领导人之一，有“红色教授”之称。

1919年在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求学时，他投身“五四运动”，发表《社会问题》一文，公开介绍《共产党宣言》中的“十条纲领”，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之一。同年，在上海入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科，次年7月去日本留学，1922年夏又自费留美，一年多后回国至沪，至1925年10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之前，主要生活在上海，并在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1931年张闻天回国，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任中央政治局常委。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遵义会议后被推举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党的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头起了重要作用。

编者的话

回顾中国革命的漫漫征程，伟大的先驱者抛头颅、洒热血，以生命的代价换来的星星之火，成就了后来的燎原之势。

追忆中共早期四位领导人的峥嵘岁月，无论他们的人生曾随时代的风云历经怎样的跌宕起伏，他们身上所共同拥有的，对理想坚定不移地追求、对事业忠心耿耿的付出，舍弃自己献身革命的无畏精神至今仍绽放着耀眼的光芒。

后人或许早已无法想象他们在上海的工作、生活，可当年，他们就是从这里出发，践行着一位革命者的梦想和追求。

秦邦宪之女秦吉玛（左五）、女婿李海渊（右四），张闻天之子张虹生（右三）、瞿秋白外孙女李晓云（右二）及家属与福寿园集团副总经理葛千松（左一）、邬亦波（右一）合影

著名雕塑家唐锐鹤教授现场指导雕塑创作

福寿园艺术总监王松引教授进行创作

张闻天之子张虹生（右三）等家属赴福寿园参观雕塑创作

瞿秋白外甥女、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吴幼英及家属与瞿秋白夫妇纪念像合影

秦邦宪：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年轻的领导人

他留下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理论译著

他出身望族，乃名门才俊；早年留苏，自取俄文名字，回国后以中文音译“博古”为化名；他曾译有大量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在党内有较高的威望。

秦邦宪（1907-1946），江苏无锡人，北宋著名词宗秦观的第三十二代孙。又名博古，是中国共产党著名领导人之一，也是卓越的党的新闻事业奠基人。

秦邦宪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24岁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遵义会议后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代理主任、主任，1941年在延安主持创办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并任社长，同时兼任新华社社长、中央出版局局长。

1946年4月8日，他以中共代表身份参加国民参政会，从重庆回延安途中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牺牲时他年仅39岁。

博古生前译有大量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毛泽东在“七大”号召各级干部加强理论学习，至少要读五本书，其中《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就是博古从俄文版翻译而来。

千秋英烈

翻译俄文版《共产党宣言》

1942年10月，为配合延安整风运动，中宣部成立了翻译校阅委员会，因为博古精通俄文，所以他也是成员之一，他根据俄文版《共产党宣言》对原有译本作了重新校译，并增译了该书1882年俄文版序言。

博古从俄文版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有三个特点：第一，增加了一篇序言，共有四篇序言；第二，译法更接近于现代汉语；第三，是1949年前流传最广、印行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版本，不仅广泛流传于解放区，而且还流传于白区、敌占区，其发行量估计有几百万册。此译本如今在我国图书馆、博物馆有大量珍藏本。

摘自《较早把〈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的中国人》

社会各界纪念“四八烈士”

1946年4月8日，出席国共谈判与政治协商会议的中国共产党代表王若飞、秦邦宪乘飞机由重庆回延安，同机的还有刚被党组织营救出狱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出席在巴黎举行世界职工代表大会回国的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邓发及著名爱国教育家黄齐生先生等13人，因飞机失事，不幸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遇难，史称“四八空难”。

4月13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痛悼死者》：“他们是为和平民主事业而死的！他们是为坚持政治协商会议全部协定——特别是宪草原则协定、坚持停战协定、坚持整军协定而死的！这三大协定代表中国人民的希望，是我们党和全国人民一起要求其贯彻实现的……”

4月19日，延安3万多群众在延安机场隆重举行追悼“四八烈士”大会。毛泽东为烈士亲笔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4月30日，上海各界追悼“四八烈士”大会在玉佛寺举行。在灵堂遗像上方，挂着一幅柳亚子所题的“精神不死”的竹布横额，两旁是宋庆龄的挽联。

摘自《延安叙事》

在延安举行的追悼“四八烈士”万人大会

他们眼中的博古：睿智和蔼的年轻人

第一次在延安见到博古，从外表上看，他是一种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形象，俨然是一幅漫画——瘦长脸，端庄文弱，略带倦意，还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他那浓密而蓬乱的头发使他看上去显得头重脚轻，智力超常。阿奇博尔德·克拉克·科尔先生戏称他是一个“黑面木偶”。

——（美）海伦·福斯特·斯诺（**1937**）

1927年底，在莫斯科召开了世界劳工代表大会。我是代表之一。第一次见到博古，就是在这次大会上——他在会上当翻译。那时，苏联正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政府正集中全力搞重工业，所以，物价很高，代表们每天要花费10个卢布买吃的。有些代表觉得那里的生活不能令人满意，但博古向我解释这种情况的意义，并分析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困难——这种困难要求代表们也应当过一种艰苦的生活。听他这样谈话，我觉得很合自己的口味，所以很快就喜欢上他了。他也很愿意听我讲国内1925—1927年的大革命，因此，我们常常一起散步。我们结婚是在1928年5月。

——刘群先（**1937**）

博！我悲痛你死在中国人民和平民主事业尚未完成的时候，我悲痛你死在正有作为的时候。你天资英俊，性情刚果，你有奔放的革命热情和独特才能，你还懂得英、俄两国文字，能说

能写，你正当壮年，在毛主席领导下，还能做更多于人民有益的工作，分担毛主席及我们中央同志一部分的繁劳。我更悲痛的是你死得这样突然，使我不能见到你最后的一面，更无法得到你给我和孩子的一句遗言。

—— 张越霞《悼博古》（**1946**）

那还是1930年的时候，我们住在霞飞路，忽然有一位穿香港布长袍的青年人来访了。他说了一个我们朋友的名字，我们明白了他是一个共产党人，他是为一种工人报纸来要我写文章的。他坐在靠窗的长沙发上，把正事办完了之后并没有说走，他同我们谈起最近出版的文艺的作品来，他看得似乎很多，而且有很多好意见。大约是因为在做着秘密工作的缘故，他的声音没有后来爽朗，也不纵声而笑，但他的眼睛却比后来更为闪烁，这是一个极为聪明的人呵！我们当时便想，可惜以后他就没有再来过。直到1936年我到保安的时候，那时我知道他就是有名的博古同志，仍然像一个大学生，他常常笑，他忽然问我还记不记得他，我说我从没有见过博古同志，但他的样子似乎是见过的，于是他笑了，说我的记忆好，又说还到过我的家里，他历述了我家里所陈设的东西，于是我也笑了，说他的记忆力比我更好，我便回述了他当时所谈的一些什么问题，他也补充了我是怎样答复的。我说不是我的记忆力好，而是你给我的印象深。我想着怎么那个穿香港布长袍的青年就是现在的中共的组织部长和苏维埃的中央政府的主席呢？而且即使是现在也还是这样年轻啊！

——丁玲《我们永远在一起》（**1946**）

1943年1月，我调到《解放日报》副刊部，当秘书和编辑。那时候，社长是博古。我报到的第一天，就见到他。他给我的印象是，身材高大，对人和蔼，在我已见过的党的领导人中是最年轻的（36岁）。当时他还兼新华通讯社社长、中央出版局局长。这几个单位都分散在清凉山从西到东的几个山头上。博古的威望很高，正如后来他遇难时，《解放日报》副总编辑余光生、艾思奇和新华通讯社副社长陈克寒联名写的悼念文章中所说：“对于我们从事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的人们来说，是丧失了一个最有权威的指挥官和亲密的战友。”

——温济泽《知过即改，方为马列》（**1997**）

张闻天：从上海走出来的革命翘楚

他将毕生积蓄交了最后一次党费

他是一个儒雅谦逊的人，一个稳重厚道的人，在事关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他都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明知前方骤雨狂风，还总是站在真理这一边。

张闻天（1900–1976），上海市浦东南汇人，原名应皋，曾化名洛甫，字闻天。张闻天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张闻天早年赴日留学，1922年夏又自费留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在遵义会议上被推举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为挽救党和红军做出了重大贡献。1951年后，张闻天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外交部第一副部长。1959年张闻天被错定为反党集团成员，文革中受尽迫害，于1976年7月1日含冤病逝。1979年8月，中共中央对其冤案予以平反昭雪。

革命有了“家”，我和闻天也成了家

1935年11月初，党中央在甘泉县下寺湾开会，决定中央领导人分两部分行动。会后，毛主席、恩来同志和彭总率红一方面军南下同徐海东、程子华同志率领的红十五军团会合，粉碎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张闻天带领党中央机关北上，到瓦窑堡安家。

我们进瓦窑堡时，正是雪后初晴。陕甘边区政府组织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几千人夹道欢迎，敲锣打鼓，挥舞红蓝三角纸旗，非常热烈。许多地方张灯结彩，还演戏。这里石窑洞、砖瓦窑洞比较多，因此叫瓦窑堡。当时它是陕北根据地的政治、经济中心，现在成了党中央的落脚点。

到了瓦窑堡，闻天征求我的意见：这下有了家，可以了吧？于是我们就结成了终身伴侣。组织上分给我们一孔石窑洞，挺漂亮。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也没有请客，情投意合，环境许可，两个行李卷合在一起就成了。倒是毛主席来窑洞闹了一闹，算是补了“闹新房”的一课。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的正式确定，是毛主席、恩来同志从前方来到瓦窑堡以后，在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即著名的“瓦窑堡会议”）上定下来的。

这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议，是在我们家住的那孔小石窑洞里举行的。窑洞内陈设简陋。炕前有一张旧方桌和几条长凳。只有窗纸是新糊的，显出生机和喜气。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们精神都很振奋。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与红十五军团联合作战，在直罗镇前线打了胜仗，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被粉碎了；同共产国际中断了一年多的联系如今恢复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已经基本上确定，重大的政策改变已经开始了；从国民党统治区又传来了北平学生“一二九”反日游行示威的消息，一个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正在全中国兴起。中国革命摆脱了危机，走出了困境。

摘自刘英《我和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

张闻天故居：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清朝光绪年间，上海南汇县祝桥区六团乡那片方圆750平方米的茶褐色土地上，张氏族亲在奔前忙后地盖建新楼。新楼建成了——这是一座旧时浦东农村里非常典型的一正两厢式三合院瓦房，坐北朝南。有正屋5间，两侧厢房各2间，西厢房外侧另有杂用房4间，共13间。中间是砖铺天井，前面有木结构的门亭一座。走廊的柱子和屋内窗格子、门梢上都雕有花纹。正屋前的场地上有一个木结构的秀才亭，屋后有小河流过的潺潺水声……

1900年8月30日，张闻天就出生在这所颇有资产的书香门第之居。原名张应皋。6年后，启蒙老师张桂唐取《诗经》中“鹤鸣九皋，声闻于天”之意，为之取名“闻天”。17岁他考取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读书期间，深受《新青年》杂志的影响。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于

张闻天故居

1920年至1922年先后赴日本和美国留学。1925年“五卅运动”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担任党内主要领导人之一。

为了秘密工作的需要，从1931年起，张闻天与家里中断了联系。1932年他的母亲病重，家人只得在上海《新闻报》上刊登启事：“应皋，母病危，盼见报速归。”当时张闻天就在上海，咫尺天涯却不能回家探望。当张闻天再回到家乡时，已是30多年之后的1958年，响应党的号召到上海和杭州基层调研，顺便回家中探望。张闻天最后一次回故乡，是在1962年。此时的他在中国科学院任“特约研究员”，仍孜孜不倦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

1986年9月，陈云为故居书额“张闻天同志故居”。1989年2月，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拨款进行全面维修，按原貌修复。2002年张闻天故居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1月，张闻天故居被上海市政府命名为“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编自《上海名人故居沧桑录》

千秋英烈

父亲在无锡的最后岁月

1975年4月28日，父亲再次写信要求迁往离上海近一点的苏州或无锡居住。这个要求虽然获准了，但当他到达无锡时，他的生命只剩下不到一年的时间。

1975年5月，父亲经中央同意迁居无锡。父亲写信要我回去帮助搬家，我特地请事假由新疆赶到广东肇庆。一到家，父亲就兴奋地对我说：“你回来太好了，我6年的看管生活结束了，组织上同意我到江南定居、养病。”

我这次亲手扶着父亲从肇庆，经广州到上海，再转汽车到无锡。我把他一直送到无锡，在那呆了不到一个月，等他安家好了，我才走。

这时候的父亲已经解除了监护，恢复了工资，可以看发至县委的文件。1969年4月11日，毛泽东谈中共九大代表人选时，建议将我父亲作为反面教员选为代表，但那也算是毛主席表态给我父亲的问题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后来对我父亲就稍微好一点了。

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他每天或者埋头书斋研习政治理论，阅读古籍报刊，常常忘了吃饭、睡觉、服药；或者走访居民家庭，调查研究。

1976年1月9日早晨，父亲突然听见收音机里传出哀乐，周总理去世的消息传了出来。父亲当时在刷牙，他站在那里愣住了，听完讣告，眼睛已经湿润。他对工作人员说：“周总理是少有的人才，没有周总理，我们这些老干部早就不知到哪里去了！”

1976年4月以后，“批邓反对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了。父亲这时已经患有冠心病、慢性肾功能不全、肺部感染等疾病，短短的时间里先后7次病危。

父亲的心脏病严重时，由于无锡的医疗条件比较差，医疗小组提议把我父亲转到南京工人医院或者上海华山医院治疗。但是，未获当时的江苏革委会批准。父亲病情危急时，南京工人医院的心脏病专家马文珠去过一次，华山医院专家也去过一次。在当时的条件下，无锡对我父亲还是不错的。

从1975年11月发病到1976年7月1日去世，父亲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和母亲商定：二人的存款，死后交给党，作为二人最后所交党费。

1976年7月1日，父亲突发心脏病去世，不许召开追悼会，母亲准备的花圈上也只能写“献给老张同志”，骨灰盒上的名字写着“张普”。

父亲去世的时候我还在新疆。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我赶到无锡时，父亲已经去世十几天了。等我去和母亲见面时，父亲已是殡仪馆杂物间里的一盒骨灰。

节选自张虹生《与父亲最后的日子》

福寿园倾心打造红色经典胜地

上海

新四军广场：向老军长致敬

为缅怀新四军的功绩，继承和发扬光荣传统，同时纪念新中国成立后为上海的建设发展做出贡献的新四军老战士，上海市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决定在上海建造新四军纪念墙，把新四军战士的名字镌刻在一起。

经过四年筹建，上海新四军广场于2005年10月12日在福寿园正式落成。此后，每年10月成了福寿园的红色十月。近千名新四军老战士，都会在这一天齐聚广场，老战士们称之为“归队日”。而福寿园的新四军广场就是他们的“归队广场”。每一次归队，老战士都会为故去的战友献上一束鲜花；每一次归队，老战士们都会笑谈当年勇。

2013年10月12日，新四军广场落成八周年之际，陈毅军长塑像也在此落成，“老军长”终于回到战友身边，永远站在队伍最前方。

文/晏宜亮

位于上海福寿园新四军广场内的陈毅夫妇塑像

安徽

丰碑园：建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大蜀山文化陵园前身是大蜀山革命公墓，始建于1965年，主要安葬革命烈士、县团级及以上国家干部、1945年8月15日前入伍的革命军人等。为使革命公墓重新发挥其“缅怀先辈、教育后人”的使命，2002年大蜀山文化陵园本着“继承光荣革命传统、弘扬爱国主义优秀文化”的建园宗旨，在挖掘潜力和自我改造方面努力并进。

园区现建有革命烈士主题广场——丰碑园、公安民警教育区、红十字教育区、人文纪念馆等四大功能区。据统计，陵园每年接待社会各界人士数十万人来园参观和瞻仰先烈，正成为一个重要的红色经典教育基地。因此被评为“合肥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AAA国家级旅游景区。

文/李晶

山东

老战士纪念广场：吹响集结号

山东老战士纪念广场

山东老战士纪念广场于2010年4月21日正式落成。纪念广场占地6000平方米，主体建筑是全长72.6米的纪念墙，纪念墙中间是一组山东兵南征北战、英勇杀敌的大型雕塑，两边以“军”为单位镌刻着老战士的姓名，原军委副主席迟浩田上将为广场题词。截至目前，老战士广场纪念墙上已刻有3万多老战士的姓名。但由于广场纪念碑面积所限，现在仍然有近8000名老战士的姓名没有镌刻。为了满足老战士们“集结老部队”的急切心情，山东省委老干部局联合山东福寿园于2013年国庆期间筹备建造广场二期工程，现已基本竣工，将于2014年4月21日落成。此次扩建，还在广场增添了室外查询机、山东兵行军路线图及条形椅、警戒线，为参观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另外，山东福寿园还在每年4月21日为老战士纪念广场举办周年纪念活动，届时会邀请老战士、市民及媒体共同参加，一起缅怀战斗英雄，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弘扬山东兵精神。

文/刘佳

辽宁

锦州帽山公墓：为功臣铸丰碑

帽山公墓红军墙

红军墙

2001年5月，锦州帽山公墓决定修建集安葬、观瞻为一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军墙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占地面积99.12平方米，全长10米。红军墙上镌刻着40位曾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流血奋战、出生入死，后来又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鞠躬尽瘁的革命功臣们。意在让后人高举他们的旗帜，发扬他们的精神，继承他们的遗志，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文明、更加民主、更加富强，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英魂永铸”纪念碑

位于墓园中心地段的功臣园，建于2001年。功臣园占地面积7000平方米，是为革命献身的老红军以及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后来又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先辈英灵安息之地。

2001年7月，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布赫亲自为功臣园的英雄纪念碑题词：“英魂永铸”。

文/高大鹏

“英魂永铸”纪念碑